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落日故人情>>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落日故人情>>

13位ISBN编号：9787540764494

10位ISBN编号：754076449X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时间：漓江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内容概要

《落日故人情》收录巴金、季羡林、铁凝、汪曾祺、傅雷、冰心、丰子恺、王安忆、龙应台、严歌苓等60余位作家的65篇佳作，或追忆骨肉情深，或怀念良师益友，或回望萍水相逢。
以人映史，以史论情，在体现当代作家的人文关怀、散文艺术的多样化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
《落日故人情》是从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发表的散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旨在检阅散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散文。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作者简介

葛一敏，《散文选刊》主编，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
乔叶，《散文选刊》副主编，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著有《最慢的是活着》（鲁奖）《拆楼记》等。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 <<落日故人情>>

## 章节摘录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记得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那时我们住在北京的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极不相称的小楼上。
我们坐在火炉旁，偶然谈起他的童年生活来了。
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他的出身。
这以前，也曾知道一点，却实在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不知为什么他很少同我谈，也不知为什么，我简直没有问过他。
但从这次谈话以后，我是比较多了解他一些，也更尊敬他一些，或者更恰当地说，我更同情他了。
他祖父是做什么的，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总之，不是做官，不是种地，也不是经商，收入却还不错。
也频幼小时，因为身体不好，曾经长年吃过白木耳之类的补品，并且还附读在别人的私塾里，可见那时生活还不差。
祖父死了后，家里过得不宽裕，他父亲曾经以包戏为生。
也频说：“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要特别关心到下雨。
”他描写给我听，说一家人都最怕下雨，一早醒来，赶忙去看天，如果天晴，一家大小都笑了，如果下雨，或阴天，就都发愁起来了。
因为下雨就不会有很多人去看戏，他们就要赔钱了。
他父亲为什么不做别的事，要去做这一行，我猜想也许同他的祖父有关系，但这猜想是靠不住的。
也频一讲到这里，他就更告诉我他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都要去看戏。
我还笑着说他：“怪不得你对于旧小说那样熟悉。
”稍微大了一点后，他不能在私塾附读了，就在一个金银首饰铺当学徒。
他弟弟也同时在另一家金铺当学徒。
铺子里学徒很多，大部分都在作坊里。
老板看见他比较秀气和伶俐，叫在柜台上做事，收拾打扫铺面，替掌柜、先生们打水、铺床、倒夜壶，来客了装烟倒茶，实际就是奴隶。
晚上临时搭几个凳子在柜台里睡觉。
冬夜很冷，常常通宵睡不着。
当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去想，在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疑问。
他常常做着梦，梦想能够到另一个社会里去，到那些拿白纸旗、游街、宣传救国的青年学生们的世界里去。
他厌弃学打算盘，学看真假洋钱，看金子成色，尤其是讨厌听掌柜的、先生们向顾主们说各式各样的谎语。
但他不特不能离开，而且侮辱更多地压了下来。
夜晚当他睡熟了后，大的学徒跑来企图侮辱他，他抗拒，又不敢叫唤，怕惊醒了先生们，只能死命地去抵抗，他的手流血了，头碰到柜台上，大学徒看见不成功，就恨恨地尿了他一脸的尿。
他爬起去洗脸，尿、血、眼泪一齐揩在手巾上。
他不能说什么，也无处诉苦，也不愿告诉父母，只能隐忍着，把恨埋藏在心里。
他想，总有一天要报仇的。
有一天，铺子里失落了一对金戒指，这把整个铺子都闹翻了，最有嫌疑的是也频，因为戒指是放在玻璃盒子内，也频每早每晚要把盒子拿出来摆设，再搬回柜子里，他又很少离开柜台。
开始他们暗示他，要他拿出来，用各种好话来骗他，后来就威胁他，说要送到局子里去，他们骂他、羞辱他、推他、敲他，并且把他捆了。
他辩白，他哭，他求过他们，一切都没有用；后来他不说了，也不哭了，任凭别人摆布。
他心里后悔没有偷他们的金戒指，他恨恨地望着那些首饰，心里想，“总有一天要偷掉你们的东西！”戒指找出来了，是掌柜的拿到后边太太那里去看，忘了拿回来。
他们放了他，谁也没有向他道歉。
但是谁也没有知道在这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欲望，一个报复的欲念。

在这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这个金铺子的学徒失踪了，同时也失踪了一副很重的大金钏。
金铺子问他的父母要金钏，他父母问金铺子要人。
大家打官司、告状，事情一直没有结果。
另一家金铺把他弟弟也辞退了。
家里找不着他，发急，母亲日夜流泪，但这学徒却不再出现在福州城里。
也频怀着一颗愉快的、战栗的心，也怀着那副沉重的金钏，惶惶然搭了去上海的海船。
他睡在舱面上，望着无边的翻滚的海浪，他不知应该怎么样。
他曾想回去，把金钏还了别人，但他想起了他们对他的种种态度。
可是他往哪里去呢？
他要去做什么呢？
他就这样离开了父母和兄弟们吗？
海什么都不能告诉他，白云把他引得更远。
他不能哭泣，他这时大约才十四五岁。
船上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
他得想法活下去。
他随船到了上海。
随着船上的同乡住到了一个福州人开的小旅馆。
谁都相信他是来找他舅舅的。
很多从旧戏上得到的一些社会知识，他都应用上了。
他住在旅馆里好些天了，把平素积攒下来的几个钱用光了，把在出走前问他母亲要的几块钱也用光了，“舅舅”也没找着。
他想去找事做，或者还当学徒，他一直也没有敢去兑换金钏，他总觉得这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决不定究竟该不该用它。
他做了一件英勇的事情，却又对这事情的本身有怀疑。
在小栈房的来客中，他遇到一个比他大不了一两岁的男孩子。
他问明白了他是小有天酒馆的少东家，在浦东中学上学。
他们做了朋友，他劝他到浦东中学去。
他想起了他在家里所看见的那群拿白纸旗的学生来。
他们懂得那样多，他们曾经在他们铺子外讲演过，他们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他们是和金铺子里的掌柜、先生、顾主完全不同的人，也同他的父母是不同的人，虽然他们年纪小，个子不高，可是他们都使他感觉是比较高大的人，是英雄的人物。
他曾经很向往他们，现在他可以进学堂了，他向着他们的道路走去，向一个有学问、为国家、为社会的人物的道路走去。
他是多么的兴奋，甚至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啊！
于是他兑换了金钏，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小部分交了学费，交了膳费，还了旅馆的债。
他脱离了学徒生活，他曾经整整三年在那个金铺中；他脱离了一个流浪的乞儿生活，他成了一个学生了。
他替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胡崇轩。
这大约是一九二〇年春天的事。
他在这里读书有一年多的样子，他的行踪终究被他父亲知道了。
父亲从家乡赶到上海来看他，他不能责备他，也不能要他回去。
也频如果回去了，首先得归还金钏，这数目他父亲是无法归还的。
他只得留在这里读书。
父亲为他想了一个办法，托同乡关系把也频送到大沽口的海军学校，那里是免费的，这样他不特可以不愁学膳费，还可以找到一条出路。
这样也频很快就又变成一个海军学生了。
他在这里学的是机器制造。

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与文学发生关系，他只想成为一个专门技术人才；同时也不会想到他与工人阶级革命有什么关系，他那时似乎很安心于他的学习。
他的钱快用完时，他的学习就停止了，海军学校停办。
他到了北京。
他希望能投考到一个官费的大学，没有成功。
他不能回家，又找不到事做，就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
有的公寓老板简直无法把他赶出门，他常常帮助他们记账、算账、买点东西，晚上就替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
他有一个同学是交通大学的学生，这人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很会用地主剥削农民的方法和也频交朋友。
他因为不愿翻字典查生字，就叫也频替他查，预备功课，也频就常常每天替他查二三百生字，从东城到西城来。
他有时就留也频吃顿饭，还不断地把自己的破袜子旧鞋子给也频。
也频也就把他当着唯一的可亲的人来往着。
尤其是在冬天，他的屋子里是暖和的，也频每天冒着寒风跑来后，总可以在这暖和屋子待几个钟头，虽然当晚上回去时街道上是奇冷。
除了这个地主儿子的朋友以外，还有一个官僚儿子的朋友也救济过他。
这个朋友，是同乡，也是同学；海军学校停办后，因为肺病，没有继续上学，住在北京家里休养。
父亲是海军部的官僚。
这个在休养中的年轻人常常感到生活的寂寞，需要有人陪他玩，他常常打电话来找也频，也频就陪他去什刹海，坐在芦席棚里，泡一壶茶。
他喜欢旧诗，也做几句似通非通的《咏莲花》《春夜有感》的七绝和五言律诗，他要也频和他。
也频无法，也就只得胡诌。
有时两人就在那里联句。
鬼混一天之后，他可以给也频一元钱的车钱。
也频却走回去，这块钱就拿来解决很多问题。
一直到也频把他介绍给我听的时候，还觉得他是一个很慷慨的朋友，甚至常常感激他。
因为后来也频有一次被公寓老板逼着要账，也频又害了很重的痢疾，去求他的时候，他曾用五十元大洋救了也频。
可惜我一直没有见到过，那原因还是因为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曾把他这些患难时的恩人骂过，很不愿意也频再和他们来往；实际也有些过激的看法，由于生活的窄狭，眼界的窄狭，就有了那么窄狭的情感了。
穷惯了的人，对于贫穷也就没有什么恐慌。
也频到了完全无法应付日子的时候，那两个朋友一些小小施予只能打发几顿饭，打发一点剃头、一点鞋袜，而不能应付公寓的时候，他就把一件旧夹袍、两条单裤往当铺里一塞，换上一元多钱搭四等车、四等舱跑到烟台去了。
烟台有一个他同学的哥哥在那里做官。
他就去做一种极不受欢迎的客人。
他有时陪主人夫妇吃饭，主人要是有另外的客人，他就到厨房去和当差们一道吃饭。
主人看见是兄弟的朋友，不便马上赶他走，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安，他还不能懂得许多世故，以为朋友曾经这样约过他的，他就不管。
时间很长，他一个人拿几本从北京动身时借的小说到海边上去读。
蔚蓝的海水是那样的平稳，那样的深厚，广阔无边，海水洗去了他在北京时那种嗷嗷待哺、亟亟奔走的愁苦，海水给了他另一种雄伟的胸怀。
他静静地躺在大天地中，听柔风与海浪低唱，领会自然。
他更任思绪纵横，把他短短十几年的颠簸生活，慢慢在这里消化，把他仅有的一点知识在这里凝聚。
他感到了所谓人生了。

他朦胧地有了些觉醒，他对生活有了些意图了。
他觉得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
在他的身上，有了新的东西的萌芽。
他不是一个学徒的思想，也不是一个海军学生的思想，他只觉得他要起来，与白云一同变幻飞跃，与海水一道奔腾。
于是他敞衣，跣足，遨游于烟台的海边沙滩上。
但这样的生活是不会长久下去的。
主人不得不打发他走了。
主人送他二三十元的路费，又给了他一些庸俗的箴言，好像是鼓励他，实际是希望他不要再来了。
他拿了这些钱，笑了一笑，又坐上了四等舱。
这一点点钱又可以使公寓老板把他留在北京几个月。
他非常喜欢这些老板，觉得他们都是如何宽厚的人啊！
北京这个古都是一个学习的城，文化的城。
那时北京有《晨报》副刊，后来又有《京报》副刊，常常登载着一些名人的文章。
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
也频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跑旧书摊（他无钱买书，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读起外国作品来了；在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剪下来，贴在墙上。
还有准备做诗人的一些青年人，也稍稍给他一些眼光，和几句应酬话。
要做技术专家的梦，已经完全破灭，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与艺术气质，一天一天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称。
一九二四年，他与另外两位熟人在《京报》编辑了一个一星期一张的附刊，名为《民众文艺周刊》。
他在这上边用胡崇轩的名字发表过一两篇短篇小说和短文。
他那时是倾向于《京报》副刊、鲁迅先生的，但他却因为稿件的关系，一下就和休芸芸（沈从文）成了文章的知己。
我们也是在这年夏天认识的。
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
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
因此我们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
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
他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
那一个时期他的诗，的确充满了这种可悲的感情。
我们曾经很孤独地生活了一个时期。
在这一个时期中，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们却蛰居北京，无所事事。
也频日夜钻进了他的诗，我呢，只拿烦闷打发每一个日子。
现在想来，该是多么可惋惜的啊！
这一时期如果应该受到责备的话，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
因为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已经老早就进过共产党办的由陈独秀、李达领导的平民女子学校，和后来的上海大学。
在革命的队伍中是有着我的老师、同学和挚友。

我那时也曾经想南下过，却因循下去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
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马日事变”等等才打醒了我。
我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
我恨北京！
我恨死了北京！
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
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
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
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
我的苦痛，和非常想冲破旧的狭小圈子的心情，也影响了也频。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都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能个人摸索着前进，还不得不把许多希望放在文章上。
我们两人加上沈从文，就从事于杂志编辑和出版工作。
把杂志和出版处都定名为“红黑”，就是带着横竖也要搞下去，怎么样也要搞下去的意思。
后来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坚持下去。
但到上海后，我们的生活前途和写作前途都慢慢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
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轻时代的确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也频是一个坚定的人。
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
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其他的社会科学书籍。
他毫不隐藏他的思想，他写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
》。
那时我们三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
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
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
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
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但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
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
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确对从实际斗争上退到文学阵营里来的革命者有过一些意见），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
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
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
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
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挚友，不得不常常无言地对坐，或话不由衷。
这种心情，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
办“红黑出版处”是一个浪漫的冒险行为，后来不能继续下去，更留给我们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
也频为着还债，不得不一人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
一个多月以后，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
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
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
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的欣喜。
我问他：“ 你都懂得吗？
”他答道：“ 为什么不懂得？
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
”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
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这的确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他参加了学校里的一些斗争。
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
有些同学们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使校长、训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说普罗文学了。
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学校都轰动起来了。
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
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
晚上，也频和我又谈到这事，同他一道去济南教书的董每戡也在一道。
我们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依着我的经验，我说一定要找济南的共产党，取得协助，否则，我们会失败的。
但济南的党怎样去找呢？
究竟我们下学期要不要留在这里，都成问题。
也频特别着急，他觉得他已经带上这样一个大队伍，他需要更有计划。
他提议他到上海去找党，由上海的关系来找济南的党，请他们派人来领导，因为我们总不会长期留在济南，我们都很想回上海。
我和董每戡不赞成，正谈得很紧张时，校长张默生来找也频了。
张走后，也频告诉我们道：“ 真凑巧，我正要去上海，他们也很同意，且送了路费。
”我们不信，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是二百元。
也频说：“ 但是，我不想去了。
我要留在这里看看。
”我们还不能十分懂，也频才详细地告诉我们，说省政府已经通缉也频了，说第二天就来捉人，要抓的还有楚图南和学生会主席。
何思源（教育厅长）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校长甘冒风险，特为送了路费来，要他们事先逃走。
看来这是好意。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什么惧怕。
也频的意见是不走，或者过几天走，他愿意明白一个究竟，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那起同学，他要向他们说明，要勉励他们。
我那时以为也频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做什么秘密组织工作，只宣传普罗文学难道有罪吗？
后来还是学校里的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他劝我们走。
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较与我们靠近的，他自然多懂些世故。
经过很久，才决定了，也频很难受地只身搭夜车去青岛。
当我第二天也赶到时，知道楚图南和那学生会主席也都到了青岛，那年轻学生并跟着我们一同到了上海。
上海这年的夏天很热闹，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
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

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
他很少在家。
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
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
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里写我的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是八月间的事吧。
也频忽然连我也瞒着参加了一个会议。
他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我没有问他。
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封瞿秋白同志写给我的信。
我猜出了他的行动，知道他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
各地的共产党负责人都参加了，他形容那个会场给我听。
他们这会开得非常机密。
他说，地点在一家很阔气的洋房子里，楼下完全是公馆样子。
经常有太太们进进出出，打牌、开留声机。
外埠来的代表，陆续进去，进去后就关在三楼。
三楼上经常是不开窗子的。
上海市的同志最后进去。
进去后就开会。
会场挂满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
会后是外埠的先走。
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
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更引起也频的浓厚的政治兴趣。
我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
”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
”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的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
以前当我们有了些稿费后，我们总爱一两天内把它挥霍去，现在不了，稿费收入也减少，有一点也放在那里了。
取消了我们的一切娱乐。
直到冬天为了我的生产，让产期过得稍微好些，才搬了一个家，搬到环境房屋都比较好些的靠近法国公园的万宜坊。
阳历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
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
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
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
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
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
我没有问他。
总之，他很激动地哭了。
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
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
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

他是那样有信心。
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
我说：“好，你走吧，我将一人带着小平。
你放心！
”等我出医院后，我们口袋中已经一个钱也没有了。
我只能和他共吃一客包饭。
他很少在家，我还不能下床，小孩爱哭，但我们生活得却很有生气。
我替他看稿子，修改里面的错字。
他回来便同我谈在外面工作的事。
他是做左联工农兵文学委员会工作的，他认得几个工人同志，他还把其中一个引到过我们家里。
那位来客一点也不陌生，教我唱《国际歌》，喜欢我的小孩。
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情感。
为着不得不雇奶妈，他把两件大衣都拿去当了。
白天穿着短衣在外边跑，晚上开夜车写一篇短篇小说。
我说，算了吧，你不要写那不好的小说了吧。
因为我知道他对他写的这篇小说并不感兴趣。
他的情绪已经完全集中在去江西上面。
我以为我可以起来写作了。
但他不愿我为稿费去写作。
从来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写；只要当我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尽量张罗，使家中生活过得宽裕些，或者悄悄去当铺，不使我感到丝毫经济压迫，有损我的创作心情。
一直到现在，只要我有作品时，我总不能不想起也频，想起他对于我的写作事业的尊重，和尽心尽力的爱护与培养。
我能把写作坚持下来，在开始的时候，在那样一段艰苦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有也频那种爱惜。
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党组织的会有时就来我们家里开。
事情一天天明显，他又在上海市七个团体的会上被选上，决定要他去江西。
本来商量我送小平回湖南，然后我们一同去的，时间来不及了，只好仍做他一人去的准备。
后来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一定要同去的话，冯乃超同志答应帮我们带孩子，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孩子。
这件事很小，也没成功，但当时我们一夜没睡，因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不到，而在革命队伍里面，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情感。
这时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
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日了，也频要走的日子临近了。
他最近常常去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接头。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走。
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
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中午他没有回来。
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
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
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
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
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
从文坐了一会走了。
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
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
我不能待下去，又怕跑出去。
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镇静下我的心。
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
到后来，我想到乃超的住处，便走到福煦路他的家。
我看见从他住房里透出淡淡的灯光，去敲前门，没有人应；又去敲后门，仍是没有人应。
我站在马路中大声喊，他们也听不见。
街上已经没有人影，我再要去喊时，看见灯熄了。
我痴立在那里，想着他们温暖的小房，想着睡在他们身旁的孩子，我疯了似的又跑了起来，跑回了万宜坊。
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啊！
我的孩子！
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
这次我走进了他的屋子。
乃超沉默地把我带到冯雪峰的住处。
他也刚刚起来，他也正有一个婴儿睡在床上。
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
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到一个书店找保，但没有被保出来。
他们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没有旁的什么办法，他们自己每天也有危险在等着。
我明白，我不能再难受了，我要挺起腰来，我要一个人生活。
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许久以来都已经在等着似的，好像这并非偶然的事，而是必然要来的一样。
那么，既然来了，就挺上去吧。
我平静地到了家。
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
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
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
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绝不会投降的。
他现住在老闸捕房。
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
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下午李达和王会悟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我不得不离开了万宜坊。
第二天沈从文带了二百元给我，是郑振铎借给我的稿费，并且由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我去找他。
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
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
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
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
上海从十八号就雨雪霏霏，我因产后缺乏调理，身体很坏，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脚上长了冻疮。
我很怕留在家里，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一点似的。
跑了几天，毫没有跑出一个头绪来。
但也频的信又来了。

我附了一个回信去，告诉他，我们很好，正在设法营救他。
第二天我又去龙华司令部看他。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
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
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
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
看守的答应了。
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
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
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 频！
频！
我在这里！
”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
我对从文说：“ 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
”他还穿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放在衣袂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
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
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
也频也曾要我送两条单裤、一条棉裤给他，要求从裤腿到裤裆都用扣子，我那时一点常识也没有，不懂得为什么他要这种式样的裤子。
从牢里送一封信出来，要三元钱，带一封回信去，就要五元钱。
也频寄了几封信出来，从信上情绪看来，都同他走路的样子差不多，很有精神。
他只怕我难受，倒常常安慰我。
如果我只从他的来信来感觉，我会乐观些的，但我因为在外边，我所走的援救他的路，都告诉我要援救他是很困难的。
邵力子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
那位说可以设法买人的也回绝了，说这事很难。
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二三十个人都上了脚镣手铐，不是重犯不会这样的。
我又去看也频，还是没有见到，只送了钱进去，这次连影子也没有见到。
天老是不断地下雨、下雪，人的心也一天紧似一天，永远有一块灰色的云压在心上。
这日子真太长啊！
二月七日的夜晚，我和沈从文从南京搭夜车回来。
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会帮助另一个作家。
我也太幼稚，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
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
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 这是办不到的。
也频决不会同意。
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
我也不愿意他这样。
”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
从文知道这事困难，也就不再说话。
我呢，似乎倒更安定了，以一种更为镇静的态度催促从文回上海。

我感觉到事情快明白了，快确定了。
既然是坏的，就让我多明白些，少去希望吧。
我已经不再做有什么希望的打算。
到上海时，天已放晴。
看见了李达和王会悟，只惨笑了一下。
我又去龙华，龙华不准见。
我约了一个送信的看守人，我在小茶棚子里等了一下午，他借故不来见我。
我又明白了些。
我猜想，也频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究竟怎样死的呢？
我总得弄明白。
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了一个相片册子，里面有也频，还有柔石。
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相。
谁也没说什么，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
这天夜晚十二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
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二月七日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
我说：“嗯！
你回去休息吧。
我想睡了。
”十日下午，那个送信的看守人来了，他送了一封信给我。
我很镇静地接待他，我问也频现在哪里？
他说去南京了，我问他带了铺盖没有，他有些狼狈。
我说：“请你告诉我真情实况，我老早已经知道了。
”他赶忙说，也频走时，他并未值班，他看出了我的神情，他慌忙道：“你歇歇吧！
”他不等我给钱就朝外跑，我跟着追他，也追不到了。
我回到房后，打开了也频最后给我的一封信。
——这封信在后来我被捕时遗失了，但其中的大意我是永远记得的。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跟着他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
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有很大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
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材料寄出来给我。
他估计他既不会投降，那么总得有二三年的徒刑。
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很年轻。
他不会让他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
他希望我把孩子送回湖南给妈妈，免得妨碍我的创作。
孩子送走了，自然会寂寞些，但能创作，会更感到充实。
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
他勉励我，鼓起我的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日子，并指出方向。
他的署名，是“年轻的爸爸”。
他这封信是二月七日白天写好的。
他的生命还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样充满了希望。
可是就在那天夜晚，统治者的魔手就把那美丽的理想、年轻的生命给掐死了！
当他写这封信时，他还一点也不知道黑暗已笼罩着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生命的危殆，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只能留下这一缕高贵的感情给那年轻的妈妈了！
我从这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啊！
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

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
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轻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已地痛哭了，疯狂地痛哭了！
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
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地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
”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
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
……”李达先生说：“你明白吗？
这一切哭泣都没有用处！
”我失神地望着他，“没有用处……？
”我该怎样呢，是的，悲痛有什么用！
我要复仇！
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事好，就走到窗前去望天。
天上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
后来又有人来告诉我，他们是被乱枪打死的，他身上有三个洞，同他一道被捕的冯铿身上有十三个。
但这些话都无动于我了。
问题横竖是一样的。
总之，他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
二十年来，我没有一时忘记过他。
我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
他人是死了，但他的理想活着，他的理想就是人民的理想，他的事业就是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这事业是胜利了啊！
如果也频活着，眼看着这胜利，他该是多么的愉快；如果也频还活着，他该对人民有多少贡献啊！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
中国古代有俞伯牙二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
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
陵墓极雄伟，E履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
墓后石墙上嵌有“ 德艺双隆 ”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 我的朋友 ”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
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曾说：“ 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
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
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r。
”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又说：“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
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
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万方《怀念我的父亲曹禺》

## 编辑推荐

《落日故人情》编辑推荐：篇篇名家，章章佳作，60余位作家集体抒写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描写细腻动人，感情自然真挚。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